

## 毛澤東研究的核心問題

### ——毛澤東崇拜的發生與個別意志的循環

◎ 董 標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一場歷時悠久、影響深廣的思潮和運動。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和政治文化，它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中的宏大主題和政治文化分析中的重要環節，是展開對毛澤東的全程性和全面性研究的核心問題，實有必要從多方面入手，揭示其生發流變。

多年來，在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富有啟發性，但基本上都是西方研究者做出的。林登（Robert Watland Rinden）把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起源追溯到長征，認為延安時代的早期仍然屬於醞釀階段，並沒有成為現實（materialized）。<sup>1</sup>懷利（Raymond F. Wylie）謂「1937年正在興起毛澤東崇拜」；<sup>2</sup>陳志讓說，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大約」從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始；<sup>3</sup>施拉姆強調「名副其實的對毛澤東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風運動期間」。<sup>4</sup>雅各布斯和漢斯（Dan N. Jacobs & Hans N.）說，毛澤東崇拜「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派伊（Lucian W. Pay）主張這要「從斯大林死後」算起，布里奇曼（Philip Bridgman）認為是「1959年才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的」。<sup>5</sup>

以上論點的不同時間參照都有獨特意義，所循標準各有所指，明裏暗裏傾向於把毛澤東崇拜的形成與毛澤東權力的擴張聯繫起來。這是合理的探討途徑之一。因為崇拜對崇拜者而言，既是權力讓渡過程，也是情感信任行動。從被崇拜者一面看，崇拜是權力行使的無形保證，是行為操縱的合情形式。所以，可以把這些時間和標準各異的論點，看作是很有價值的假說。它們能夠激發對中國現代史的一些關節點之事實和意義的再認識的興趣，可以啟發人們在21世紀初，反思這場駁雜的思潮和多向的運動，揭示它與現實社會的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文化狀態的關係。

不過，如果研究者的焦點集中於並停留在個人崇拜與個人權力的關係上，就會或多或少地把問題簡化，並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問題孤立化。本文傾向於把毛澤東崇拜與特定集團的自我保存、自我優化和毛澤東的個人發展結合起來探討之，而不是分而治之。本文假定，毛澤東崇拜的發生，受其成功的個人奮鬥因素的推動和扭曲的個人發展方向的調控，更有特定集團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優化的欲求和意志，與集團成員的文化心理結構的自然結合的情勢驅使。後者在毛澤東崇拜的形成中具有決定意義。從技術層面上說，在毛澤東崇拜的發生過程中，有對傳統文化的聖明之道的模仿，也有對馬列主義的階層取向的援用。前者是毛澤東崇拜獲得成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後者是特定集團得以穩固的政治和思想資源。

#### 一、公眾人物的成長：棄教育取政治

毛澤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出現在20世紀的中國舞台，開始於1915年。那年，他向長沙「一些有名學校」寄發了一份署名「二十八畫生」的《徵友啟示》，引《詩經》語「願嘤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求志同道合者，還在信封上注明「請張貼.....」字樣。<sup>6</sup> 1917年4月，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之名，在《新青年》上發表長篇論文《體育之研究》。同年10月至次年5月，毛澤東擔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友會的「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上任伊始即編印了《夜學招學廣告》。到1917年11月5日，出過「兩次廣告」。<sup>7</sup>半年後，新民學會成立大會在蔡和森家裏舉行。<sup>8</sup>再過幾個月，毛澤東到了北京。

新民學會發起時，它是互助合作的自我教育團體。這可以從發起原因上看出來：「第一個根本原因」是由於「品性要改進，學問要進步」；第二，宜「追求」「動的生活與團體的生活」；第三，「諸人大都係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要「作成一種奮鬥的向上的人生觀。」但是，到了「（民國）10年1月1日，在文化書社開會」時，討論的卻是這樣三個問題：「新民學會應以甚麼作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須用甚麼方法？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sup>9</sup>於是就有了「改造中國與世界」之類的主張和爭論。這次會議，是新民學會演變為一個政治團體的標誌。學會成員，據說後來「全部加入了共產黨。」<sup>10</sup>

這幾件事的意義各別。《徵友啟示》的當年，毛澤東及其同學身處「龍蛇爭大地，虎豹滿環瀛」的中國，滿懷「傾洋滌宇宙，重建此乾坤」的熱情，期盼「一同登樂園，萬世慶升平」未來。<sup>11</sup>悲憤和焦渴，孤獨和苦悶、自信和勇敢、希望和超越等等複雜感受觸發的徵友行動，象徵著個人與群體相結合的生命活動方式，在毛澤東規避孤獨、懷疑自我的求索中和在直接應對實踐問題時的獨有價值。與此同時，毛澤東又無心認定群體生存一定優於個體存在，毋寧說相反：

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個人、社會、國家皆個人也，宇宙亦一個人也。故謂世無團體，只有個人，亦無不可。<sup>12</sup>

從中可見行動領域的群體價值取向與信念領域的個人價值至上的激烈衝突，表明毛澤東還沒有發現信念與行動相契合的可行途徑。

「軍國民」或者「尚武」之類的辦法能否改變這種衝突狀態呢？〈體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爭取到一個自我檢驗和自我推介的機會。《新青年》是中國思想界的新星，不是韶山沖上的流星。那時，長沙固然是湖南的思想中心，但也是中國思想的邊緣。毛澤東已有佔領湖南中心的實力和地緣，有進入中國中心的毅力和機緣——在啟蒙思想家的講壇上發表高見，預示著抓住機會、跨越邊緣的努力已經做出。很難說他的努力是成功還是失敗，只是發現在「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的磅礴大勢底下，<sup>13</sup>壓抑著「欲圖主觀之有效，非動其何觀」的悖論，說明毛澤東仍然不能用信念排遣苦惱意識，仍然沒有找到解釋世界的理論模式，莫說變革世界了。他試探了行動優先的選擇和由近及遠的原則，擬從身邊事著手：

列位大家來聽我說句白話。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麼，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話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都是個人，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同木石一樣！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

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sup>14</sup>

這是一次把個人努力訴諸民眾教育的嘗試，文化手段成為人的變革的突破口。問題是一群困惑的青年給一群苦難的「木石」發些「並不要錢」的「講義」，能發給多少人，又能發多久？不管青年學生動了怎樣的「主觀」，又是多麼「自覺」，都不過曇花一現。<sup>15</sup>如果夜學順利，新民學會就會保持其「教育團體」的本色，未必很快演變成一個政治團體。教育之路，未走通。

毛澤東以公眾人物出現的舞台，終於變成他消解苦惱意識、忘卻文化行動失敗的政治舞台。政治，總在解放和統治的兩極之間漂泊搖擺，總在不同集團和各個階層間取舍定度。

毛澤東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時候，他就是政治家。這篇小說發表於1929年，題目叫《嫌疑》。<sup>16</sup>從1925年10月7日起，毛澤東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部長」，1926年5月28日顧孟余接任這一職務。<sup>17</sup>滿打滿算，毛澤東任是職八個月。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澤東沒有當選中央委員。這說明在20年代中後期的國共兩黨內，毛澤東都不在最高級領導人之列，作者把1926年的毛澤東描繪為「鼎鼎大名的共產黨領袖」，顯然不是歷史語言的記述，但有文藝的先見之名並不失為高明預見。就集團和階層的定位而言，作者對毛澤東的把握極其準確：「共產黨領袖」——一個特定集團的領袖<sup>18</sup>：

如果當人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並進行討論時，公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勾結；那末從大量的小分歧中總可以產生公意，而且討論的結果總會是好的。但是當形成了派別的時候，形成了以犧牲大集體為代價的小集團的時候，每一個這種集團的意志對它的成員來說就成為公意，而對國家來說則成為個別意志；這時候我們可以說，投票者的數目已經不再與人數相等，而只與集團的數目相等了。分歧在數量上是減少了，而所得的結果卻更缺乏公意。

姑且不論「共產黨領袖」的「個別意志」有甚麼特定內涵，重要的是文學語言表現了毛澤東本人已經開拓的政治發展空間的廣度，預示著毛澤東棄教育取政治之後，未來的發展具有多種可能性。

## 二、領袖人物的定型：化政治為教育

其實，小說《嫌疑》發表之前，毛澤東已經陷入長期的、全面的生存危機、知識危機、情感危機和政治危機。直到1935年之前，他在政治舞台上並不得志。其中的多數時間，在中共這個特定集團內部，他即使不是邊緣化人物，也絕不是中心人物。他也切罕有自我充實、自我提高的機會，但其性格似乎決定了他不可能消沉下去。表（1）概括了毛澤東此間的危機與行動。

表1：1927年到1931年毛澤東的危機和行動

年/年齡	危機	行動
1927/34	(1) 險些喪命，「有六七次我都不抱希望	「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

	了。」 <sup>19</sup>	『左』。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縱橫十里燒光，說要把小資產階級改造成為無產階級。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 <sup>20</sup>
1928/35	(2) 與中央隔絕。(3) 「甚麼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 <sup>21</sup>	朱毛會師，成立四軍。 <sup>22</sup> 朱毛紅軍「甚至有被反動勢力消滅的可能」。戰略錯誤：「不發動群眾，不深入鬥爭，保守與流寇觀念。」 <sup>23</sup> 「與中央斷絕了關係並有許多客觀上的困難。」「你們的軍隊」「始終只是做了一些燒殺的工作甚至主張燒毀城市，在你們軍隊的本身上說，現在還是一種國民黨時代的僱傭式的軍隊，未加以組織上政治上的改造。」 <sup>24</sup>
1929/36	(4) 知識飢荒「到了十分」，精神亦疲倦。(5) 想去俄國留學。	「不惟知識感特異的飢荒，精神亦表現疲倦」，想派22人留俄，望中央安排。 <sup>25</sup> 「三年以來中央的刊物我們一本沒有收到」，在湘贛邊界時，「曾兩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到瑞金後才「見青天」。 <sup>26</sup> 自己想「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 <sup>27</sup> 「我知識飢荒到十分，請你（李立三）時常寄書報給我」。 <sup>28</sup> 「請購一批書。」 <sup>29</sup> 「紅軍的學校化」，「到達一個縣城只要三小時，宣傳工作可以普遍」。 <sup>30</sup> 制定《土地法》。
1930/37	(6) 與中央路線衝突。(7) 11月楊開慧犧牲。「失驕楊」，「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sup>31</sup>	提出「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 <sup>32</sup> 中央認為，朱毛「站在農民的觀點上來作土地革命」（農村第一，城市第二），「反映了農民意識」，「割據的觀點」，「機會主義的觀點」。 <sup>33</sup> 右傾的危險、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取消或縮小紅軍的觀念。 <sup>34</sup> 2月，創辦隨軍紅軍學校，任校長。 <sup>35</sup> 最大規模的《尋烏調查》和較之「歷次調查要深入」的《興國調查》，後者第一次做了家庭調查，「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礎概念。」 <sup>36</sup>
1931/38	(8) 失軍事指揮權，軍務轉政務。	(秋) 與何長工、鄧萍談創辦紅軍幹部學校事。9月28日，到達瑞金，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 <sup>37</sup>

秋收起義的部隊於1927年10月轉戰至水新、寧岡兩縣交界的三灣村之前，毛澤東已經發現「這支隊伍在戰鬥中有不聽指揮、紀律鬆懈、不會做群眾工作的現象。有的人還有舊軍隊的不良習氣，亂拿群眾的東西；有的人有農民意識，愛佔小便宜。另外，還有官兵關係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氣等問題。」這支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sup>38</sup>必須通過全面的整頓來提高其戰鬥力，隨後有「三灣改編」。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毛澤東本人，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的時候，也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確的目標，所以，未來的幾年發生的事變，多不是切實可行的計劃的實現，而是有不少隨遇而安、隨機而作的結果，可能預料的變化，並不佔主導地位。

經過短期的軍事活動主導的時期以後，毛澤東接手「政府」工作。此間，軍務比政務重要，但政務總比軍務關涉更廣泛的領域，也更能考量個人的知識體系和能力結構。並且，相對軍務而言，政務又是新生事物。所以，毛澤東經營政務的情況，將在未來的發展中具有全面的意義。此間的幾年，除了軍事戰略的制定和戰役戰鬥的指揮之外，毛澤東的最大成就感可能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中共的社會處境和基本任務的有了整體性認識：「帝國主義打倒之後，全國才可以統一，工業才可以發展，中國整個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這是中國共產黨

第一個責任。」「推翻封建剝削，解決土地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者責任。」這兩個責任，要求「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個責任。」<sup>39</sup>在這樣的認識指導下，解放的興趣及其鮮明，並且擴大到對比較廣泛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動員上。發佈《告綠林兄弟書》，宣稱你們是我們的「窮朋友」，土豪劣紳罵你們是「土匪」，是加給你們的罪名。<sup>40</sup>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地位和作用，引起毛澤東的另一種注意方式，不再是「活動學生」，而是要「學生起來幫助工農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加入工農革命的隊伍裏來」。與此同時，學生與商人，已經被認為是「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sup>41</sup>另一個成就感就應該是在農村社會的調查方面，這也是他幾乎終生珍惜這些調查的一個原因。而為人關注的文化和教育文化，儘管不再是毛澤東工作和活動的中心，但他的工作和活動的任何中心，也都不可能置文化事務和教育工作之外。所以，在軍事教育方面、在黨內教育方面、在社會動員方面，毛澤東都形成和積聚著影響力和感召力。

從1936年初到1941年，是毛澤東崇拜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五年，是對毛澤東未來起決定作用的五年。毛澤東第一次以「領袖」的身份出現在官方刊物的顯要位置上，是在1936年1月：「延安城，抗日人民在聽到抗日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張總政委等到延安時，在抗日救國會積極動員下，舉行盛大的歡迎……。」<sup>42</sup>這時，毛澤東等領導的軍隊，還未與日本軍隊交鋒過。被「積極動員」起來的延安人民，把未來想象為過去，把理想寄托於現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報道的標題有「抗日領袖毛主席」字樣，正文有「毛主席，朱總司令張總政委等」說法，顯見毛已經在朱和張之上，這比較符合1935年毛澤東在中共生存危機中顛簸式的崛起情況。

1937年6月1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發表了署名「坦克」的木刻作品《朱德》。（見圖1）

圖 1 木刻《朱德》



作克坦

志同德 朱



# 东村事件

## 丁玲

在去年秋天、差不多就正是這個季節、陳得祿、顯得年輕得多、剃過了頭、那低矮的額頭就

走過丰臨口、全丰臨口的人都拿顏色給了他同情的迎送。那些不在大路邊的村莊上、遠遠的富耕

好像寬闊些、長長的微向上豎著的眉毛和眼睛在厚重畫有了不少的漂亮成份。不過却正是那時開始在聚燈看眉毛了。有時帶着一點呆滯、有時又覺得很煩燥、常常在向城裏去的那條沿電線的大路上。他走過枹坪、枹坪的老少都跑出來關心的詢問，他又

露出是陳家老二時、也就互相低語著、談論他最近所遭過的事。就是有許多不滿意他的地方、也因為三番五次看見他過去過來、人在時間中、又只給了別人憔悴老去的印象、一個差不定的境遇便也就被猜想出了。一個種田人的倒楣了

不會被一個種田人擬想得太遠。

他的父親、陳大爹、正被押在洛城的牢裏、爲了幾年的積欠、幾乎有了一百担、那個主趙老爺却告了他的刁頑將他送到牢裏來了、自然也還關得有其他許多同樣的囚犯。他被關後沒有十天、便發出一場病。這使得在城裏做裁縫工人的陳得福連妻子都餓了飯。得福的家裏、那住在趙家莊上的一家、連七七也在內、同時也陷入了危境。七七是一個蛋養媳、有十五歲了、只等稍稍有幾個錢時就要開臉同得福同房。但瞞著人兩個似乎早已在一些竹林子裏、稻草堆裏面、有了些情懷。他們曾經到趙老爺家去磕過頭、也沒有用。城裏衙門的人告訴他說只要原苦器口、懺悔狀子、就沒有事了。但趙老爺比泥做的菩薩還難求。這事一天天使家裏人走入了悲觀。

是一天的傍晚了、得祿又垂頭喪氣的從城裏回家、剛剛走到轉灣的地方、從這裏飛進去、經過一片柚子樹林子、便可以到他莊子上了、忽然從林子裏發出一個聲音：

「得祿、你老子的病、怎麼壞了？」

一看、原來是那個趙老爺常常走動的李八爺、得祿覺得有一股東西從心中升起、皮膚底下便發熱。却又不願先開罪、只好答應他。自於聲音總有點懸。

「年輕伙子，」李八爺穿一件黑夾袍走過來、拍拍他肩膀：「天無絕人之路、但得設法時

圖 2 木刻《毛澤東》



克坦

像東澤毛

策、回到美國、使國聯成為保衛和平的有力武器、與一切民主的及人民陣線的政府成立友好同盟、——法國、斯干的那維亞、捷克斯拉夫——和世界的主要的和平保證者聯訂互助的自衛同盟。希特勒統治四年後的今天，在德國成為了人民陣線發動者以及在千百萬同胞們的心中至高

至大的那種情緒，是被我們現在生存着的最偉大的德國作家托瑪斯，發、用最有力的字句描寫了出來，他對於德國人民陣線委員會的支持，非凡的充實了與加強了它。四月十日在給委員會的一封信中他寫着：  
——在精神上對於四月十日舉行的人民陣線的

會談談我將積極參加，從我的心裏願意你們的討論能夠幫助弄清那些影響我們如此之深的问题，必須用一切方法來構成或感一個綱領，使本國國內或國外渴望者一個真正能配得上日耳曼這個名字的政府的、一切尊貴的德國人們，能夠在這個綱領上合作。

恢復現在他們所沒有的自由權利，及關於自由與人性的觀念，十分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支持一個新的與良好的日耳曼國家，而且唯有通過他們我們才能接近到那種現在激動着德國人民的渴望之心。在這種信念上，必須有一個能夠自立起來保衛自己的自由、和在破壞者之前知道這點的一種人性之信念上，我認定我自己跟德國的人民陣線是統一的。  
——漢華譯自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新觀察」

「日本帝國主義獨怕我們的這種努力——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百折不撓，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  
——毛澤東——

一周以後，同一作者的另幅作品《毛澤東》（見圖2），也在這份刊物問世了。<sup>43</sup>懷利（Raymond F. Wylie）指出，這兩幅木刻雖然出自同一位作者，並且兩位領導人都是正面像，但在處理手法上，「截然不同」（radically different）。毛澤東那幅，以昂首闊步的

紅軍和迎風飄揚的旗幟為背景，突出的是燦爛陽光下容光煥發的毛澤東。作品下邊還引用了毛澤東的語錄「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懷利說，毛澤東這幅，畫面上闊步的紅軍和飄揚的旗幟生動有力，朱德那幅相形見绌。而且朱德那幅下面的空白處，也沒有自己的語錄。光芒萬丈襯托下的毛澤東，特像傳統中國的一個皇帝。正是這種形象，後來成了「毛澤東崇拜」（the cult of Mao）的特點。所有這些都清楚說明，1937年正在興起毛澤東崇拜。六個月以後，一本《毛澤東文選》在上海出版。除了毛澤東之外，不但當時中共沒有第二個領導人擁有過這種榮譽，而且，在毛澤東在世期間，也沒有。<sup>44</sup>

的確，毛澤東那幅的左下方有自己的語錄，朱德的沒有。但從版面上看，《毛澤東》那幅有「補白」的需要。《朱德》那幅，由於丁玲的小說《東村事件》把版面佔得滿滿的，沒「白」要補。所以，本文寧願把在「補白」處援引「毛澤東語錄」這件事，看作偶然的，無意的，不一定是作為這幅木刻的要件而精心配置的。這種偶然和無意地用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列寧和魯迅等）的語錄來補白的做法，在1937年間延安的宣傳工具上的確常見。

提到列寧，就是暗示象確立毛澤東的無上地位這樣的大事，不是中共的自主問題，而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國際問題。懷利持有的那種單純的「中共中心觀」，說明不了毛澤東崇拜這樣的國際問題的複雜性。

毛澤東最早用「國際語言」說話的時間，比他的文學形象出現得早。1927年6月25日的《共產國際》俄文版、英文版和沒有注明出版日期的《東方革命》雜誌第2期，都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部分）。布哈林讚賞這篇報告，認為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出版物中，它極為出色，最為清晰，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農村中的各種口號也令人很感興趣。」<sup>45</sup>與此同時的局內人說，「中國農民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澎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sup>46</sup>同文同人，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意義。意義的不同，雖說是文章具有多種理解的可能性所致，但最終完成這些理解的，不是死文章，而是活人，而且還要看是甚麼人。萬不可輕視共產國際中人。因為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奇特關係，決定了的中共的重大舉措，只有獲得共產國際的認可，才獲得合法性。從這個背景上說，20世紀20年代後期，「國際」對毛澤東的初步印象良好。這還可以從共產國際陰錯陽差地刊發的毛澤東逝世的訃告中看出來：

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仇敵。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sup>47</sup>

這是用「國際語言」系統論定毛澤東的最早文獻，1930年3月20日發表在國際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上。共產國際論定的毛澤東地位頗高，諸如「奠基者」、「創立者」、「締造者」「之一」的字眼，表明毛澤東這位「政治領袖」雖然只是一顆流星，但也是光彩照人的「國際」人物。與文學語言相比，國際語言的訃告，既遵循了訃告語言的規制——「贊揚性」，<sup>48</sup>也符合共產國際對中國情勢和毛澤東的無知的實際。<sup>49</sup>兩種語言描述的毛澤東，雖然把他合理定位在中國（農民）社會與馬列（共產）主義的交叉點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提升



毛澤東的國際地位。直到30年代後期，對「國際思維」相對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中共人物，仍不是毛澤東之輩。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王稼祥和任弼時分別以不同的名分，被派往莫斯科。前者回延安後傳達了季米特洛夫（個人）表示支持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口信」，後者在莫斯科積極介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主動向共產國際宣稱「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sup>50</sup>這說明30年代末期，是毛澤東地位的「國際合法化」時期，是毛澤東開拓自己的「國際」發展空間的時期。按照毛澤東已經形成的由近及遠的思維法則來分析，在中共生存危機期間崛起的他，在中共內部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地位，高於共產國際的定位。

1940年初，延安創辦了一所意在「加深培植青年幹部的高級學校」，它有一個響亮得不能再響亮了的字號：「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預定的講課人包括洛甫、康生、林伯渠、鄧發、陳伯達、艾思奇、毛澤東等。<sup>51</sup>其規格（層次）之高，可見一斑；其用意之深，亦能想象。1940年7月，地位和聲望都很高並且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微妙的王明，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一篇開創性的文章，就是在這所學校首次宣講的。王號召青年「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地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結的精神」。<sup>52</sup>王所論的「五大精神」，未必體現在毛澤東身上，也不會只體現在毛澤東身上。與其說王概括的這些「精神」重要，不如說由他出來講些無關緊要的話，比由其他很多人講很多很動聽的話，效果要好得多。因為王明或者王明式人物，長期以來在中共黨內代表共產國際、在共產國際代表中國共產黨。王明「學習」毛澤東，象徵著共產國際和特定集團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一致認同，這對發起毛澤東崇拜的「國際」合法性具有實質性意義。王明在發起毛澤東崇拜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中共的其他任何人物無法比擬的，何況他還把「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偉大的理論家」、「天才的政治家」、「公認的領袖」等桂冠，<sup>53</sup>戴到毛澤東頭上。王明或者王明們的出場，宣告了實行毛澤東崇拜的國際箭令已為毛澤東掌控。所以，毛澤東不可能因為王明最終促成了崇拜合法化就認定延安不需要「整風」，以肅清各種標籤下的王明影響。<sup>54</sup>

刊發王明一文的這期《中國青年》，還在《記毛澤東同志》的總標題下，發表了四篇文章和一首詩。其中有謝覺哉對毛澤東的觀察力等方面的樸實贊揚，有莫休對毛澤東「無比的理解力和創造力」的推崇。有意思的是，徐特立把毛澤東的工作作風概括為「列寧的作風」：

「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際精神。」<sup>55</sup>而白帆則在詩中寫道<sup>56</sup>：

「不管你到那裏，  
你去聽——  
剛會說話的小弟弟  
也知道『毛主席』。

「……  
「他午夜裏工作，  
用著二十多年艱苦鬥爭的血液，  
愛護著祖國，愛護著我們。  
他的話語，  
在祖國人民心裏生了根，  
也在敵人心裏生了恨。

「……。」

編者給這個總標題加的幾句話，也值得注意：「下面所載的幾篇關於毛澤東同志的故事，雖

都是三年以前寫的，而且許多是十幾年前的事，但是對於我們青年們有很多教育的價值，所以，特為發表。」三年以前寫的那些十幾年前的事，到1940年才發表，這是為甚麼？到1940年就發表，這又是為甚麼？

「三年前」，就是1937年。這年3月9日和13日的《新中華報》，在「革命故事」專欄，連載了《徐老部長說朱毛的故事》。<sup>57</sup>這個「徐老部長」就是徐特立，這裏的「故事」，就是後來重新發表在1940年7月《中國青年》上的《毛主席的實際精神》一文的原型。「重新發表」的意義何在？把這篇文章的兩個版本要件進行一些比較，也許多少有點發現。

表2：徐特立一文兩個版本要件之比較

刊物	時間	簡稱	題目	主要內容	結尾
新中華報	1937.3	中華版	朱毛的故事	(1) 蘇區人民認為朱毛是老實人。(2) 毛主席重視社會調查。(3) 毛主席主張實行游擊性的教育。	「毛主席的工作作風確是列寧的作風。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際精神，上面我所寫的就是毛主席的實際精神，革命精神以後再寫。朱總司令的故事另一次來寫。」 <sup>58</sup>
中國青年	1940.7	青年版	毛主席的實際精神	同上。	「毛主席的工作作風確是列寧的作風。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際精神，上面我所寫的就是毛主席的實際精神。」

中華版的標題有「朱毛」兩個主角，青年版只有一個。中華版還借徐特立之筆，告訴讀者將傳誦朱德的故事。實際上，3月9日的《新中華報》，在第四版右下腳發表《徐老部長說朱毛的故事》時，也在右上角上配發朱德的畫像，並題「朱德同志是紅軍的創造者，現任人民抗日軍總司令」字樣。與之形成反差的是，青年版不就「朱毛」的故事對讀者作任何明示、暗示和承諾，只是號召「延安及各地革命的先進，多把他們所知道的毛澤東同志的故事寫一些給我們，好在《中國青年》上繼續發表，或刊發成小冊子。」<sup>59</sup>

這說明，1940年春天的中共媒體正在掀起某種形式的「塑造特定集團的特殊個體運動」。劉光的文章，也透露了同樣的信息<sup>60</sup>：

毛澤東同志的生活和鬥爭史，的確是「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經歷的最燦爛光輝的一個縮影。

他在少年的時候就是一個最富於正義感，最愛好理性，而且最倔強的人物。

毛澤東同志不只是工人的導師，而且還是工人群眾的學生。在群眾運動中間，特別在工人的罷工鬥爭中，他學得很多知識和經驗。這就是說，他之走上群眾化的道路，加上勞動者的偉大創造力的感應，使他鍛煉成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和行動家。因此，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同志當他以後領導農民運動時，指導革命戰爭時，以及分析政治問題和計劃革命時，總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為出發點。正因如此，當他深深了解到農民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主要同盟軍，是現階段民主主義主力之一時，他就親身去領導農民的鬥爭，成為千百萬勞動農民最愛戴的領袖。

劉光認定毛澤東的導師和領袖的身份及其經歷，是「五四」那一代的縮影，這是一個大膽並準確的定位，毛澤東以「導師」的形象進入新的角色。問題是在不同的光線照射下，「五

四」的縮影也可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譜。「五四」那一代，應有若干不同的縮影。但毛澤東這個「革命知識分子」的縮影，「最燦爛光輝」，鮮亮地折射出「農民」、「工人」、「學生」、「導師」、「領袖」、「戰爭」、「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等等繁紛的光譜，確實是富有個性的。這種個性，既可以說是內涵豐富的，也可以說是外延混雜的。這就要看人們如何釐定諸如此類的修飾語的不確定性了。

毛澤東集「導師」的博學、「學生」的進取、「領袖」的偉大、「思想家」的深沉、「行動家」的執著於一身時，本當打開無限的個人發展空間。但無論是「最燦爛」、「最倔強」，還是「最愛戴」等等之「最」，都是無以復加的了，暗示毛澤東的個人發展已經到了極限，這是限制之一。其二，毛澤東被釐定無產階級的導師，無論是真是假，都使他本人的言行不再面向所有人，個別意志也不允許他成為民族主義的代言人，最多只能說他「代表」了多數人。由「多數人」（「無產階級」）構造的空間發展，比由「全人類」建立起的世界來，天地小多了。

40年代之初給這位導師貼上「無產階級」的標籤，實出於「個別意志」辯護其正當性和合理性的需要，距離社會意志越來越遠，毛澤東成了不斷被割斷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臍帶的「孤行僧」。在有限和無限的悖論中，毛澤東扭曲發展的前景，逐漸展露，預示著「禿子打傘，無法無天」的來日。隨後的變遷也表明，對毛澤東的限制，作為毛澤東通過自我封閉走向自我扭曲的推動力，不是一個逐漸釋放消解的過程，而是一個有規則的宰制擴張過程：

列寧、斯大林對於布爾什（塞）維克的教育工作，極端重視。「我們中國黨的領導者對於布爾塞維克教育事業，也是異常重視的。首先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不僅關心於全黨的培養幹部底工作，經常提供許多天才的意見，而且還親自領導學校工作（如抗大），親自擔任講授，親自編寫講授提綱（如戰略學、哲學等）。此外毛澤東同志極端愛護與珍貴黨的教育幹部，關心於他們工作的困難與發展前途，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sup>61</sup>

「導師」的身份剛剛獲得，「教育家」的名號接踵而至。導師雖然高於蒙師，但也只是個教員。而教育家，確實不是大多數教員所能企及的。生死相搏的政治鬥爭，比循循善誘的教育過程，既殘酷，又複雜，為甚麼偏偏給毛澤東取個「教育家」名號而不以秦皇漢武之類的傑出政治家來比附？

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家，從孔子開始，就兼具先知和楷模的多重角色，且是治國安邦所訴求的大德大智大勇的資源和象徵。同樣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一位政治家，能像孔子那樣，萬世不為人詬病。所以，從一個方面看，「導師」演進為「教育家」，滿足了特定集團形成其個別意志所必須的向心力和絕對性的需要。向心力導源於世界解釋模式和理想建構模式的思想原則的個體唯一性，不能模稜兩可；絕對性表徵著捍衛解釋模式和行動綱領時的堅定排他性，不得含糊動搖。這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此，只有把教育家的名號賦予毛澤東，把毛澤東推向聖壇，才能既避開一切政治家為人詬病的陷阱，維繫向心力，提防離心力。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毛澤東角色的變化所致地位的提高，進一步宰制著毛澤東的發展空間並設下了新的陷阱：如果真像列寧和斯大林那樣重視教育，則說明毛澤東具有或者接近於具有列寧和斯大林那樣的教育價值觀。列寧和斯大林的角色，與歷史上的許多教育家，包括中國教育家，多有不同。毛澤東關心幹部培養，指揮幹部教育，說明毛澤東的教育價值觀出於特定集團個別意志的排他需要，與儒家教育觀中的「天下」觀念和普世意識，一天一地。然而，一旦拋棄了普遍主義，聖明的光環也失去了意義。這個損失，對一種形成中的絕對主義來說，不為不大。

向列寧和斯大林借光，即貸來「無產階級」的硬通貨，雖然可能減少損失，但有重蹈倚重洋人的覆轍的危險且絕不為毛澤東心悅誠服。看來要想生成和擴大毛澤東的月暈效應，特定集團必須擺脫倚重洋人的困境，必須說出令人心悅誠服的東西。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創建足以比照列寧和斯大林並超越中國古代教育家的品性、思想和功業——馬列主義中國化，或者毛澤東主義世界化（普遍化）；傳統文化現代化，或者普遍主義絕對化（集團化）。這些個條件，頗為苛刻。唯親力親為和協力而為相結合才有希望。

在親力親為方面，毛澤東此間寫出了他終生最重要最深刻的絕大多數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之類。王明認為，《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於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針」，<sup>62</sup>這正好是在普遍主義的方向上、在毛澤東主義世界化的方向，闡揚毛澤東主義。

在協力而為方面，毛澤東的品性、思想和功業，朝著「毛澤東式的教育家」方向建構：「忠實於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忠實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志的事業。……我們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志的學生，堅決維護者，徹底的實行者。」<sup>63</sup>

「絕對忠實於黨的宣傳教育事業，並在自己工作中行動中體現出來。我們的教育人才要學習再學習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洛甫同志那種重視黨的教育，重視思想戰線，關心於黨員幹部的培養造就事業底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學習他們如何在百忙之中為黨的教育工作而努力的那種不疲倦的態度。」

「我們的教育人才應該學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志那種創造性的方法和精神，學習他們如何掌握馬列主義的實質，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與實質、各別的原則與方法區分開來，如何以新的經驗去充實發展馬克思主義。」

「學習掌握馬列主義這一銳利的武器，去堅決地保衛真理，保衛我們黨與我們的革命，去無情地靈活地對付各種反革命的思想。」「我們更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善於把堅定的原則性和靈巧的策略指導結合起來。」

「毛澤東同志不僅是我黨最好的領袖，最好的理論家、戰略家，而且他同時又是我黨最優秀的馬列主義的宣傳家、鼓動家、教育家，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以上就是我們黨目前及將來迫切需要的列寧斯大林式的和毛澤東式的教育家底品質。」<sup>64</sup>

「毛澤東式的教育家」有別於中國古代教育家的特殊之處是無產階級取向。這樣的教育家屬於特定集團，是個別意志的造就者。這樣的教育家，以教育特定集團的全體成員為己任，但只有當他立於特定集團的全體之上時，才能履行這樣的天職。這又使他有別於列寧和斯大林那樣的教育家，而與中國古代教育家接近。就他屬於特定集團這一面而言，在民族、階層和集團之間，他的選擇明確堅定並且排他，以絕對主義為安身立命之本，馬列主義是其護身符。就他立於特定集團之上這一面而言，他超越特定集團的規範，悠然於各集團各階層之間，具有廣闊的交往空間，因此具有普遍主義的倒影和操縱民族主義的潛力。所以，毛澤東作為教育家，比他作為政治家，更有利於他和他所屬的集團，隨意地開發、利用乃至掌控馬列主義資源和傳統文化資源。

毛澤東式的教育家已經避開了一個又一個的陷阱，但新的陷阱總是不斷被人挖出來，等待著

墮落：教育家都應該成為學生的楷模嗎？這個教育理論問題，也許過於刁專古怪，一時難有廣為認同的答案。但中國古代教育家多是典範式人物，卻也是事實。而那些主張獨立探究、自由研究的教育家，是不會贊同以學生模仿自己為光榮的假設的。就此而論，毛澤東式的教育家及其培養，不是一個教育問題。這樣才能說明，為甚麼擴大毛澤東月暈效應的一切努力，顯得都是合理的；也只有如此才能預言，毛澤東沒能避開所有陷阱，總有墮落的那一天<sup>65</sup>：

我們要向無產階級的導師、世界革命領導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學習，要向我黨中央許多領導者，特別是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學習。

在張如心專心論述「教育家」的品質、於無意間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個表述方式時，葉青發表了論「毛澤東主義」的高見：「毛澤東主義」是「中國農民主義」，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sup>66</sup>葉青此論，是對「教育家」的世界解釋模式和理想建構模式的否定，粉碎了王明所謂的那根「指針」，威脅著中共的合法性，打擊著中共的正當性，侵蝕著中共的向心力，毛澤東崇拜遭到嚴峻挑戰。但葉論是一個理論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或者二者兼有？如果兼有理論和政治的二重性，則中共採取甚麼樣的策略，最為高明？理論建設是漫長的且不可能迅疾而廣泛，思想和情感動員卻會有實時而顯著的效果。以闡揚、維護、普及和提升「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世界解釋模式和理想建構模式）為焦點的宣傳戰略，是一種現實的、穩妥的選擇。

### 三、兩個毛澤東：真假毛澤東崇拜及其循環

從1936年到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和共產國際的地位，都在發生迅速的、根本性的變化，可謂內外相通、上下一體，朝著有利於毛澤東獨尊的方向發展。但有信息表明，在1936–1938年、乃至到1939年，這種變化都不是輕易可覺察的，報刊採取了某些隱晦的手法來推動這種變化。例如有《慰——獻給林彪同志》這樣的詩篇，發表在《新中華報》上：「十年戰鬥/煉就了一付鐵的身子/千萬人愛惜著你的名字/因為你創造人民自己的武裝/為了去償還中華民族的血債/.....」<sup>67</sup>這說明在30年代後期，中共度過生存危機之後，著力擴大生存空間，公開塑造整體形象。這其中包含對毛澤東形象的塑造、突出和放大，以發起不易覺察的毛澤東崇拜。同時，也說明毛澤東本人對此採取了穩扎穩打的謹慎步調，以對待集團內部的積極的和消極的阻力。但到1941年，這種包含關係顛倒過來，毛澤東崇拜代替了中共整體形象的塑造。1942年開始的「整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特定集團內部進行的一場聲威兼具的普及教育運動，以推廣毛澤東崇拜；後來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完成毛澤東崇拜的典律化並邁向社會化，也只是毛澤東崇拜的程序性工作之一。「整風」和「七大」二者在毛澤東崇拜史上的意義，都不像1936–1941年各種自成體系的隱性步調那樣具有決定性。但在解釋毛澤東崇拜的後續變遷方面，向「整風」和「七大」索取分析資源，則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談話。毛澤東給黃炎培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sup>68</sup>：

毛澤東還說，我並沒有其它資格，我只是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生。我說：我只覺你所講的，都是教育學說上的要點。二三十年以前，提倡的新教育，不就是講實際知識麼？不就是講尊重人類本能和個性麼？不就是講適應人生需要麼？

透過黃炎培的這段文字，反觀視毛澤東為「教育家」的張如心，可見張並非捕風捉影。就毛澤東作為教育家而言，黃炎培與張如心的定位不同。在黃看來，毛是一個對二三十年來的教育學說上的要點，有精銳的把握能力和實行能力的人；在張的視野裏，毛屬於「列寧式的、斯大林式的、毛澤東式的教育人才」。<sup>69</sup>黃眼中的毛澤東教育學說是大眾化的，張闡揚的教育人才是集團化的。黃炎培和張如心各自描繪了一個教育家毛澤東。毛澤東作為教育家，也分裂為黃模式和張模式。後人很難斷定，到底哪個模式更接近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二重化了，兩個毛澤東生成了，真假毛澤東出現了。

毛澤東崇拜是深廣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創造，是特定集團為其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情性的自我保存、自我辯護、自我擴張的創造，是中共在共產國際那裏爭取自主思維的權力鬥爭過程。在依附性和獨創性之間，毛澤東崇拜的起始過程標誌著前者向後者的轉變。追求獨創性和自主性的特定集團，是挑戰正統霸權的異端革命。在隨後的歷史過程中，自主和獨創異化為新型的、內在的依附性。與異化一同到來的是異端崇拜，這一崇拜是異端上升為正統霸權的標誌，是下一次異端革命的開始。

毛澤東崇拜是特定集團為其意識統一所進行的思想建設和精神動員。毛澤東和國際派等人士各自的自信和自負，決定了思想鬥爭和精神衝突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按照情勢激發出的需要來構造世界解釋模式和理想建構模式，比按照事實和原理來構造，不免多出一些對普遍主義的歪曲。似乎只有經過這樣的歪曲，特定集團的個別意志的絕對主義才能取勝。

意識統一行動必然同時依賴人事系統、話語系統、交往模式、組織氣候和宣傳機器的改組和改造。在人事系統改組和交往模式建立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措施，在形成話語系統和開動宣傳機器過程中所創造的詞匯、文風和原則，在促進組織氣候的形成時選用的教育途徑和行為模式——這些模式最終都儀式化了，它們成了「禮」（比如批評和自我批評，或者團結—批評—團結）——等等，把特定集團在初始階段的「農民黨」特徵，徹底改造了。由於特定集團取得了壟斷地位，全社會將在它的領導下，「按鑒定方針辦」，形成了另種國民性。

毛澤東崇拜，把科層化組織結構和情感性行為模式賦予特定集團，建立了集團凝聚的思想和情感基礎，創造了集權文化，擴大了威勢空間，加速了個體動員，提高了行動效率。所有這些，都有力地促成了特定集團的優化，從根本上鞏固了集團的向心力和戰鬥力。在現代管理理論中，科層與情感完全衝突，水火不容，但在毛澤東崇拜中，它們居然有時結合得天衣無縫，不能不說崇拜創造奇跡。

至於特定集團內部不間斷的分化組合，在集團的草創階段就開始了。集團的基本特性，是它的向心力與離心力的衝突賦予的。前者訴諸恒定的個人安排，後者反射波動的集團意志。個體增長了的經驗和知識，促使信仰的懷疑和選擇的修正。同時，個體間的不同組合，也使集團意志分化。因此，集團必然上演鬧劇並有生有滅。於是，特定集團中人操縱權力，假手集團內外力量，排斥離心力，強化向心力，推動集團整合，確保集團地位的永恆。這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在集團明智中，粉墨登場的社會力量，卻以懵懵懂懂的感性和感情為特色。社會蒙蔽與集團明智的關係，可謂感覺與理性、感情與智慧、信仰與利益的衝突形式。集團明智外化為個人智慧，特別是後者對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的利用，表現為理性操縱感覺，智慧撥弄感情，利益誘導信仰，現實嘲弄歷史，直到毛主義擺布馬列主義。它們協力開發了中國文化的聖明之

道，充分發揮了動眾化民原則，智巧地回應了到二十世紀40年代為止的一百年間，民眾對國家「自強」的渴望、對民族「英雄」的呼喚。有詩為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崇拜是一個歷史過程。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中期，這一運動先後從關鍵期過度到完成期，等到1945年的典律化來臨的時候，只不過是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如何把特定集團內部的毛澤東崇拜，推進到全體民眾中，使集團性與社會性相結合，以擴張集團威勢。集團中的毛澤東，像坐在聚義廳第一把交椅上的綠林好漢，體現了特定集團的打造和毛澤東個人奮鬥的成就。社會上的毛澤東，像安放在金鑾殿寶座上的神像，守護著建立在社會之上的集團利益的堅實性和永恒性。這個目標的實現，與其再說是毛澤東個人奮鬥的結果，不如直說是特定集團齊心協力地扭曲毛澤東的個人發展使然。

毛澤東崇拜非法化的完成期，要從1980年算起。2月29日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sup>71</sup>7月30日，中共發佈指示，「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其它領導人像和題詞也按同樣原則處理。毛主席像章要盡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費大量金屬材料。」<sup>72</sup>前者說明，毛澤東崇拜在導致慘烈的無價生命的無謂犧牲的同時，中共形象受損。<sup>73</sup>後者暗示，毛澤東崇拜導致的政治和經濟惡果，給世界輿論造成了中共玩政治兒戲的不良印象，動搖著政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共地位危機。中共急需「塑造整體形象」和「鞏固集團地位」，起點是廢止毛澤東崇拜。至此，「毛澤東崇拜」的非合法化基本完成。最後的完成，可能要從次年公佈的那個著名「決議」算起。

歷史不會忘記，沒有毛澤東崇拜，就沒有特定集團的昨天和今天。崇拜的合法化和非法化，都是特定集團的個別意志和內在欲求的驅動，都是絕對主義的危機問題、形象問題和地位問題的產物。而這些問題，又都是特定集團與生俱來的基本問題，也只能在集團明智與個人崇拜的互動中，尋求解決的辦法。所以，特定集團導演的悲喜劇，只有演員和觀眾的變化，沒有劇情和結局的不同。因此有理由問，廢止真毛澤東崇拜，是不是假毛澤東崇拜的起點？

## 註釋

- 1 Robert Watland Rinden, *The Cult of Mao Tse-tung*, (Michigan, 1969), 61, 67.
- 2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1.
- 3 陳志讓 (Jerome Ch'en) 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40。
- 4 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毛澤東》，頁201；參見頁252、292、296、303。
- 5 Robert Watland Rinden, *The Cult of Mao Tse-tung* (Michigan, 1969), 67-69.
- 6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頁66。這則《徵友啟示》的寫就、印好、發出和張貼的時間，乃至它的創意和作者，都有疑云。關於時間問題，一時也斷定不了具體日期。在內容方面，毛澤東的回憶與羅章龍的記述也不同。關於創意和作者，蕭瑜在自己的書中，用了諸如「我主張」(I suggested)，「我們討論」(We discussed)，「我們決定」(We decided) 之類的字眼，想說明創意是二人的。但他承

- 認這則廣告是" in honor of Mao"，簽署「毛澤東」三字繁體筆畫總和（二十八筆，erh shih pa pi），即我們熟知的「二十八畫生」。（Siao-yu, Mao Tes-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72-74, New York, 1973.）
- 7 毛澤東：〈夜學日志卷首〉（1917年1月），《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頁98。
  - 8 新民學會成立的日期應是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寫的是「17日」，羅章龍記的是「14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第2和4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5。當事人之一的鄒蘊真「記得」是「四月的一個星期日」。（鄒蘊真：《新民學會成立會和1921新年會議概況》，《新民學會資料》，第542頁）查百年歷，1918年4月的星期天有7日、14日、21日和28日，其中只有「14日」同時符合羅章龍和鄒蘊真兩人的記載，其它都不合。據此初步推定，4月14日是新民學會開成立會的日子。
  - 9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新民學會資料》，第2頁，第16-17頁。
  - 10 徐特立：〈論群眾路線〉（1946年11月），武衡主編：《徐特立文存》（第3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頁237。
  - 11 羅學瓚：〈詠懷（與諸友僱舟游水陸洲一周後）〉，黃綱正主編：《歷代名人詠長沙詩詞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頁340。
  - 1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51-153。
  - 13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65。著重號是原有的。
  - 14 毛澤東：《夜學招學廣告》（1917年月3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94。
  - 15 「因戰事影響，南軍退守衡永，北軍進駐本校，同學零星，存者不過百余，不能再行研究，本會遂與校中各事，同歸停頓。」（毛澤東：《學友會5月10日事錄》（1918年5月29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11，參見頁115）
  - 16 作者是徐雉（1899-1947），浙江慈溪人。（盛巽昌、朱守芬：《學林散葉》，第2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陳旭：《誰最早把毛澤東寫進了小說》，《人民政協報》，2002年3月8日，D3）這是一篇紀實小說，作者時任林伯渠的秘書。林伯渠1926年11月的日記中，有「27日，雨。早起潤之來，同訪潤安談事。旋至政委會。又到軍部西餐。6時郭沫若召飲」的記載。（林伯渠著，林秉元、丁守和等校訂：《林伯渠日記》（1926年7月——1927年6月）（北京：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48。
  - 17 毛澤東代理和辭去宣傳部代部長的原始文件，現收藏在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楊天石查閱過。毛澤東任職期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有函件稱他為「宣傳部長」。（楊天石：《國民黨檔案中的毛澤東手跡》，《國民黨中央致毛澤東函存稿》，楊天石：《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197-210。
  - 18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2），頁39-40。
  - 19 斯諾（Edgar Snow）（1937）著，方准等譯：《紅星照耀中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 20 毛澤東1959年6月的回憶。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頁81。
  - 21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東北書店編印：《毛澤東選集》（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頁525。
  - 2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41。
  - 23 中共中央：《給潤之、湘贛邊界特委及四軍軍長的指示》（1928年8-9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670-671。
  - 24 中共中央：《致朱毛並前委的信》（1928年6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 4冊),第246頁(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執的問題。」除具體事項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註21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毛澤東選集》,頁515)。
- 25 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6月),註2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686。
- 26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61-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7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75。
- 28 毛澤東:《致李立三》(1929年11月),《毛澤東書信選集》,頁28。
- 29 毛澤東:《致中央》(1929年11月),葉永烈:《毛澤東之初》(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2),頁186。
- 30 四軍在軍事訓練上,分日常科目、戰鬥講評、實地訓練、官長討論。政治訓練方面有講演、講課、識字運動、呼喊口號、群眾大會、小組活動。「軍隊裏舉行識字運動,簡易的辦法就是要士兵認紅軍的標語,認得一個標語即將此標語包含的意義策略告訴他。」在游擊工作方面,注重調查、設宣傳兵(分文字組和口頭組)。「紅軍是工農階級的學校,官長盡是提高士兵各種文化智識」。「紅軍的學校化:此刻因在流動時期及教練人材缺乏沒有做得十分好,但較之反動軍隊,士兵的政治認識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四軍的缺點也不少:「黨軍的錯誤傾向」;「養成了群眾依賴紅軍的心理」;「囿於一隅的觀察,進步比較困難。」(陳毅(1929年9月):〈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頁759-771。
- 31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25。
- 32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563。
- 33 中共中央:《致四軍前委——關於執行新的中央路線問題》(1930年6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139-140。
- 34 陳毅(1929年9月):《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二),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頁775-776。
- 35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30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36 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年5月)、《興國調查·前言》(1931年1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18、254-255。
- 37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55、357、358。
- 38 毛澤東1959年6月的回憶。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頁265。斯諾(Edgar Snow, 1937)著,李方准等譯:《紅星照耀中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頁126。
- 39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黨部(1929):《共產黨宣言》,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室編:《紅四軍入閩和古田會議文獻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頁18。
- 40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黨部(1929):《告綠林兄弟書》,註39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室編:《紅四軍入閩和古田會議文獻資料》,頁33。
- 41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黨部(1929):《告商人及知識分子》,註39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室編:《紅四軍入閩和古田會議文獻資料》,頁24。
- 42 《歡迎抗日領袖毛主席 延安人民舉行盛大歡迎》,《紅色中華》,1936年1月16日第3版。油印件。

- 43 解放周刊社：《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和第7期，第25和24頁，中華民國26年6月4號和6月22號，延安。
- 44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1-42.
- 45 袁南生：〈早期莫斯科檔案重點毛澤東〉，《湖南黨史》，2000年第1期，頁31。
- 46 瞿秋白：《湖南農民革命·序》，瞿秋白選集編輯組：《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47-348。
- 47 袁南生、申長友：《新發現的關於毛澤東的一則史料》，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3期，第30-31頁。這期出版於1992年3月20日，正好是訃告發表62周年紀念日。這是這則訃告的全文首次翻譯為中文。
- 48 卡羅爾 (K. S. Karol) 著，劉立仁、賀季生譯：《毛澤東的中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87。
- 49 施拉姆：《毛澤東》，頁122；K.S.卡羅爾：《毛澤東的中國》，第87頁。發表《訃告》以後，有跡象顯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了解得多了，評價也高了，在把「領袖」、「旗手」這些詞用在毛澤東身上時，也顯得不那麼小氣了。參見袁南生、申長友：《新發現的關於毛澤東的一則史料》，《黨史研究資料》第3期，第31-32頁。
- 50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167、169。
- 51 〈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不日開課〉，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6期，第26頁，中華民國29年4月，延安。
- 52 王明：〈學習毛澤東〉，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2-5頁，中華民國29年7月。
- 53 王明：〈學習毛澤東〉，《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3頁和第5頁。
- 54 至於王明在甚麼情況下、基於何種動機來宣講「學習」毛澤東，詳情不得而知，王明本人在後來有個說法，大體如下：「六中全會以後，我覺在外不好就想回來。回來時是想搞好的，故1939年[澤東]青[年]幹[部] [學校]開學時弄好稿子，題為《學習毛澤東》，給毛看過，毛客氣說，理論一點不好，不要發表，後來還是發表了。」這是任弼時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中記載的。（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黨史通訊編輯部：《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第7頁）
- 55 謝覺哉：《幾個片段》，莫休：《無比的理解力》，徐特立：〈毛主席的實際精神〉，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53-60頁，延安。
- 56 白帆：〈他是我們的〉，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61頁，延安。
- 57 〈徐老部長說朱毛的故事〉，《新中華報》，1937年3月9日和13日，第4版。油印件。
- 58 著重號是原有的。
- 59 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53頁，專欄，延安。
- 60 劉光：〈「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道路〉，中國青年社：《中國青年》第2卷第7期，第31-33頁，民國29年5月5日，延安。
- 61 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編輯委員會：《共產黨人》第16期，第44-45頁，1941年3月，延安。
- 62 王明：〈學習毛澤東〉，《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第24頁。
- 63 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編輯委員會：《共產黨人》第16期，第47-48頁。其中有兩個字不可辨認。
- 64 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編輯委員會：《共產黨人》第16期，第48-

54頁。

- 65 張如心：〈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幹部修養問題之一〉，《共產黨人》第19期，第43-46頁，1941年8月。
- 66 張希賢等：《毛澤東在延安——關於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組織人事、理論宣傳和外交統戰活動實錄》（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頁306。道葉青是不是第一個如此對待「毛澤東主義」的。二十多年以後，山口一郎在1964年發表〈太平天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的禁欲主義〉一文，在指出二者的平均主義信念、重視群眾教育和軍隊紀律嚴明（禁欲主義）的相似性之後，著重揭示了毛澤東思想中的倫理原則和實踐原則，與太平天國之異。（Tamaguchi Ichirō, "The Taiping Revolution and Mao Tse-tung's Thought, particularly on asceticism", see Noriko Kamachi et al.,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5.
- 67 余修：〈慰——獻給林彪同志〉，《新中華報》1938年4月20日，第4版。鉛印件。與《共產黨人》這樣的「黨內的刊物」比較起來，《新中華報》是公開刊物。參見《共產黨人》創刊號第1頁，第81頁，1939年10月，延安。
- 68 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164、197。
- 69 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編輯委員會：《共產黨人》第16期，第47頁。
- 70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不足以化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記》）
- 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413。
-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509。
- 73 期望通過給劉少奇平反，「可以使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是敢於面對現實講話的。」（鄧小平：〈堅持黨的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頁242）。

董標男，1961年生，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學教授，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研究生，全國教育基本理論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研究領域：教育基本理論和中國現代教育思想史。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 2003年12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2003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